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本期讲坛内容正是从考古新发现入手，讲述了从考古中所提炼、展示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并以此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产生的深刻思考。这是李岩委员近日随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赴安徽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下基层”活动中，在安徽金寨干部学院所作的演讲，本期整理刊发。



▲ 李岩

以考古探究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从考古新发现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考古看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

翻开一部中华万年文化史，8500年前的乐器——骨笛赫然在目。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距今已有近万年历史的骨笛，成为人们了解古代音乐、古代文化、古代人类演化等的重要见证。

翻开一部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可以看到，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区域最初的文明（古国文明）相继形成。在龙的信仰、以玉为贵等理念方面形成共性，后来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也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雏形。

建造于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的良渚古城，随着2019年7月6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国际社会最终认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核心依据。它突破国际上流行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提出了中国方案（都城、宫殿与神庙、大墓、礼器、战争与暴力新五要素）。

回望3000多年前，成熟的汉字体系依赖有更多的出土文献佐证其前后继承关系，更多的文字文献记录传承并传播了中华文明演进史。

不止如此。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远古祖先们从距今200多万年前和距今10万年至5万年间两次出发，走出非洲分别向东北、西北方向不断进行并行化，造就了因当地气候地理环境影响下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形成不同文明的现代化之路。

如，考古遗址证实距今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已有古人类生活，周口店龙骨山人类居住遗址，展示了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场景，考古材料显示，元谋猿人（新近考古陆续有新发现）、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实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再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发现，并在2006年得到确认的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人类遗存之一，将中国古人类生存时间推至距今200多万年前，对探讨东亚人类起源、早期人类扩散、生存形式及早期人类演化的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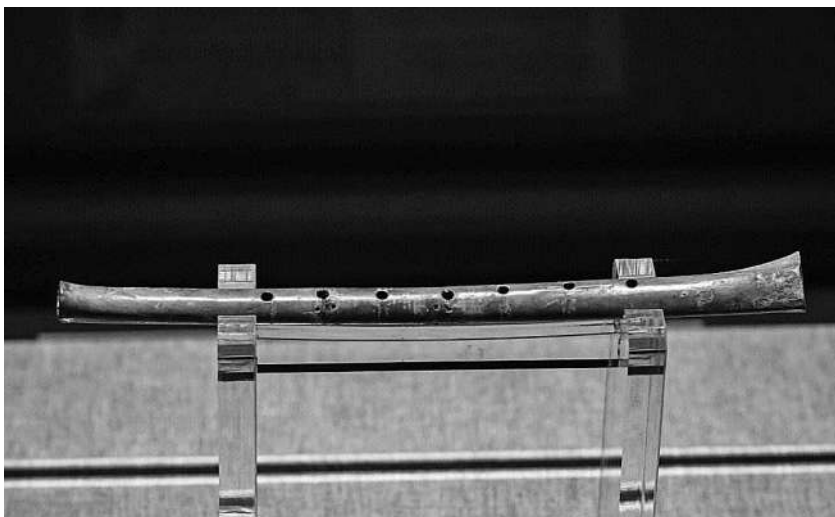
境背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见证了安徽在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此外，去年11月，安徽省考古学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2020—2021年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暨优秀考古工地”评选结果，包括芜湖繁昌人字洞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合肥市巢湖市柳家2号遗址在内的10个考古项目成为安徽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安徽的历史文化遗址众多，如大禹在蚌埠涂山大会诸侯，亳州曾作为殷商早期的国都，寿阳曾为楚国国都等。秦汉以降，寿春一直是东南区域文化教育中心、魏晋屯田的重点区域在两淮，隋朝开凿通济渠（南线汴河）和整治山阳渎，对后代大运河畅通与南北经济联系至关重要，明代安徽人文之盛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徽商雄起影响至今。因此，可以说，安徽的历史发展具有独特性与典型性。

人类作为早期的生活种群自演化了数百万年，由于文明史上的交往交融相互影响，构筑了很多的共同特征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可以勘察的文明遗迹。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来探讨文明的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科技发展不断，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考古变得更加精准、安全、有效，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丰厚更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可以参与国际考古合作（已有20余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我想，在夏商、宿白、邹英、贾兰坡、苏秉琦、张光直、王巍、陈胜前、许宏、马萧林等诸多先生所作出的考古成就的基础上，可以开展更多中外文明史的比较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凝结于中华文明的众多精神标识和文化象征之中，而这些标识与象征有的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有许多标识与象征依靠中外学者们以不同的视角来观照、比较并论证。作为出版业工作者，我想这些都为我们大力开展主题出版，丰富选题资源，繁荣出版产业提供了广阔而重要的发展前景。



▲ 贾湖骨笛 河南博物院藏

国实际人口在1300万户至1400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口。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时，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万到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有5000万至6000万（西班牙800万，法国1600万，意大利1300万，总共3700万。土耳其的欧洲部分800万，亚洲部分800万，北非的人口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人口就是主要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较之于汉代，又有新的拓展。根据学者研究和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约850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前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

第三个数字，70余国。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藩国数。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诸国，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都与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唐代鼎盛时有70多个外交使团，3万多外国留学生，一派开放繁荣的气象。

第四个数字，53915卷。这是开元年间“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唐玄宗

曾组织冯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勘四部图书。开元二十年（732）编《大唐开元礼》，这是当时最完备的礼制巨著。此后不久又完成了《大唐六典》的编纂，这是最早、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著作，可以说教化大兴。这也是反映政府机制与效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宋代更是一个持续兴盛的王朝，除了上述4个指标外，生产生活技术和物质生活水平均达到一个新高度与阶段（《三联生活周刊》推广数字阅读产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形成一时崇尚宋风，陈寅恪说中国文化迨极于宋，宋代GDP是唐代的两倍，近期《清平乐》热播也带动了《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宋仁宗：共治时代》等图书的畅销）。明初编集《永乐大典》，堪称中国历代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当今《永乐大典》系统性整理工程成为国家级重大项目，清初从辑佚《永乐大典》开始，广征集民间搜藏，形成一部煌煌大书，抄成七部分藏各地。如今国家版本馆构建“一总”（文瀚阁）“三分”（文沁、文润、文济阁）新格局，即是上承“四库全书”收藏的北四阁（文津、文溯、文溯、文源阁）南三阁（文汇、文宗、文澜阁）建制。

以文景之治、开元气象、康乾盛世为代表的昌明繁盛，也是灿烂的中华文明海外播扬的显明时代，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史志文献所印证。

在新时代展现传统文化无限魅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象、迈向新征程。作为出版人，我们应始终牢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切实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工作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发展路径，指明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长期坚持。

这“三个坚持”是有机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文化观在中国的新发展、新成果，是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我们党倡导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是我们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开关，也是新形势下处理“守”和“变”关系的科学指南。“两创”方针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

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文化建设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新创造，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和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针。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不断焕发文化生命力、创造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富矿宝藏，也是我们的使命任务之依托。我们讲胸怀“古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与中华文明探索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也曾到访过100多处历史文化遗址，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关心关切这些大问题，我想是从源头上思考并解决“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关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使得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成为出版与学术研究互动的丰厚资源。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建设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必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不断强化大局观、全局观，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统一于文化建设的实践中。

中国出版集团作为出版“国家队”，旗下有“三个人民”“商中三”

主讲人简介：

李岩，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著有《盛唐气象》《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史传卷》等多部著述，曾获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出版政府奖先进人物奖、韬奋出版奖等。

以及多个“中”字头企业这些品牌老字号，特别是荣宝斋走过351年历史，商务印书馆走过126年历史，中华书局也度过了111岁生日……这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繁荣发展起来的文化出版机构。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后代就不知道了……”据逢先知先生回忆，进北京后毛泽东让中办图书室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

的图书全部买下来，甚至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向也是他老人家确定的。可见，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机构有着鲜明的历史印记，传承着历史的品格，贯穿其中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新时代下，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在新起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今年6月2日，我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的“两个结合”有了更深的体会。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之本。二者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但是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历史事实，创造了在实践基础上会通而成的新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塑造的文化自觉。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明总是在社会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革故鼎新，实现了自身的创新性赓续。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现代性的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创新发展提供了中国化的根基。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有了更加深厚有力的文化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来，脚踩着坚实的大地，迈着雄壮的步伐，展现着文化的风采，昂扬走向光明的未来。

“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这是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实现了二者从自发的“高度契合”到自觉的“有机结合”的转变，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结合”标注了我们党自觉自信的新高度新境界。它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

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整体的全面把握；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新征程上具有高度的未来自信和理想追求；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上达到了新高度，实现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融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创造。

今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在这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标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指引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征程上的重大价值，同时通过“七个着力”来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竭的富矿宝藏，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是出版与学术研究互动的丰厚资源。作为出版从业者，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推出一批重大的传统文化主题出版项目。同时，还可以就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考古发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和非遗项目、重大古籍系统性整理工程、中外文明比较等深挖选题资源、拓宽研究领域，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自觉担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新时代，出版作为大众传播的主要载体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传承方式迎来了深沉强劲的新转向和迈向多元的新空间。中国出版集团是出版“国家队”，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担负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市柳家2号遗址

从数字看中国悠久的历史

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历史传承有序，未曾断裂。2019年7月6日，展示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良渚古城遗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有力证明了四大古代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始终延绵不绝、传承发展的只有中华文明。

4200年前，中国进行了700—800年文明热身赛。六个带有传统色彩的巨人：黄帝、炎帝、蚩尤、尧、舜、禹，完成了文明的跨越。然后是夏、商、周：前1500年到前841年（有确切历史纪年），孔子诞辰已历2570年，他所在的时候进入轴心时代，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死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亚

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中国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特质，我们叫龙的传人。中华文化具有一脉相承、血脉相连的文明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曾创造了无比的辉煌，形成多个盛世。以著名唐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对一个伟大的时代——唐代的研究成果为例，通过四个数字，说明“开元盛世”究竟有多强盛。

第一个数字，7000万人口。人口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度繁荣与否及其发展程度的最直观的指标之一。这是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的全国人口数。官方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全国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人，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